

對於中國來說，2008年是多事之年。百年不遇的巨災，百年不遇的全球性金融海嘯，以及百年奧運夢想的實現。巨大的社會經濟政治事件必將給中國帶來新的鉅變，對中國的未來之路產生深遠的影響。我刊懇切地歡迎各方學者，踴躍來稿，以各種方式，展多重視角，共同探索與反思中國的改革發展之路。

——編者

反哺農民需繼續深化改革

讀罷王飛凌〈中國戶口制度的轉型〉（《二十一世紀》2008年10月號）一文，筆者對其所論問題生出諸多感受。傳統中國是個「士農工商」的四民社會，耕讀乃社會之標準規範。可是，在當代中國，「農」的地位已經低得不能再低。「農」之地位下降，很大程度上歸因於實行至今的戶口制。這個制度人為地把人分成城市和農業戶口，並予以不公正之對待。歷史地看，城鄉戶口差別為新中國初期的重工業化做出了重大貢獻。因為，正是通過戶口管制限制農民流動的自由，使其固定在不屬於自己的土地上，通過巨大的工農業「剪刀差」，以犧牲農民利益，支撐了城市的工業化。

改革開放三十年的豐碩成果雖使農民基本解決溫飽，但大部分成果農民尚未分享。長期形制化了的城鄉二元結構不但造就了強勢的城市既得利益集團，而且歷史地造成了中國農民的「狹隘見識、低效率、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粗陋飲食、病痛不斷」，這雖令現代城市人感到怵目，卻更多地成了他們嘲笑的對象。

「胡溫新政」以反哺「三農」而開新風氣，受到廣大農民的熱烈響應，足見盼望改革心情之切。我們期待新政的繼續和改革的深入。我們不能再對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所描寫的中國農民狀況麻木不仁，因為那不既符合市場改革的本質，更不符合執政為民的理念。

在反思改革三十年之際，在中央正醞釀農村新政之時，實在有必要就戶口制及其所引發的諸類問題來一個總清算。當知識份子中為農民代言者愈來愈少、而依附於權貴者愈來愈多的時候，這種反思就更為可貴。既得利益者的代言人還要說，現在還應該集中於繼續把蛋糕做大才行，其實，相對於無恥和無限的貪欲來說，蛋糕永遠是不夠大的。

晉濤 北京
2008.10.20

非公民社會的「動員—擬態」機制

一個長期帶有「口惠而實不至」或者「言過其實」症候的

社會承諾體制，常常催生兩種對立的群體文化心理傾向：極端的樂觀主義和極端的悲觀主義。前者出於對承諾的輕信，後者出於對現實的失望。兩方面合力作用，鑄就的是一種以屢遭背叛的卑屈體驗和創傷體驗累積起來的弱勢「主體」人格。基於這種人格形態而成就的社會，之所以不能直接等同於前公民社會和反公民社會，是因為它內在地具備擇機展開「公民社會」大演習的總體動員機制。究其本質，這種演習仍是非公民社會的一部分，所以，自上而下的動員機制、組織調度，以及自下而上的公民想像及由此所致的民意訴求，往往在演習進程的諸多程序細節上，產生不可消弭的錯位甚至衝突。

張慧瑜的〈抗震救災與公民社會的想像〉（《二十一世紀》2008年10月號）一文所取的個案，或許過於沉重和嚴峻，畢竟那是一場空前慘烈的自然災害。當前，着眼於宏觀物質層面的災後重建已經全面啟動，而積聚在上千萬直接遭災民眾個體身心層面的巨大創痛，則勢必還要經歷比物質工程的恢復重建更複雜、更艱難和更漫長的療救復康過程。在這個意義上，震災之患遠遠未了結，

救災之路也理應長期延續。因而，目前與此相關的任何過早和過簡的理論選題和學術研究，都不能不顯得蒼白無力。

不過，如果僅僅是作為一扇觀察和思考的視窗，這次抗震救災的最初一個階段，確實生動而集中地展現了「公民社會」在我們的輿論傳媒和社會行為領域多維多義的曖昧蹤迹。而所有這些蹤迹，歸結到更普遍的意義上，不妨說，它們其實又在印證一個非公民社會的「動員—擬態」機制是何等有力和有效。

李林榮 北京
2008.10.21

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

哈日巴拉在〈新疆的政治力學與中共的民族政策〉(《二十一世紀》2008年10月號)一文中指出：把控制和統治非漢民族地區的希望永遠寄託在居住在那裏的某個特定民族身上是不切實際的，因為它不利於凝聚非漢民族對國家的忠誠，不利於培育忠於國家的國民，因而也經不起國內外可能發生的大震動。當中國的國力達到一定程度時候，需要一種更加開放的國內外環境，需要能夠經得起任何考驗的忠於國家的國民。作者的結論也應該會得到學者甚至中共政策制訂者的認同，至少提不出甚麼異議。不過，中國的民族問題特別是新疆問題，恐怕還真是知易行難，且新疆問題的難度也非西藏問題所能比擬。

中共在新疆的民族政策在作者所見是政治力學，而在筆者看來，實際是政策制訂過程

中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矛盾，我們不要低估了以胡耀邦為代表的中共理想主義者的真誠，但由於1990年代一系列與民族問題密切相關的國內外政治格局與政治風雲的變化，使中共政策制訂者最終選擇了現實主義路線。以胡耀邦為代表的理想主義在當時甚至現在，都難以找到扎根的土壤。問題不僅僅在中共本身，新疆其他的政治力量恐怕也還沒有能夠給這個理想主義開闢道路。

二十世紀早期，威爾遜(Thomas W. Wilson)和列寧都提出民族自決，但是全球的政治現實是，如果完全以民族作為主權的界線，國際政治的碎片化過程還將帶來更多的衝突。因而，真正現實主義的路徑是在妥協的基礎上尋找理想主義的方案，體現不同民族主體之間的相互承認。當然，如果個體作為主體能夠實現相互承認，這主權的界線就不再那麼重要或致命，看看美國吧。或者看歐洲，前捷克斯洛伐克和前南斯拉夫各民族之間在相互排斥和否定之後，又在歐盟的框架內相互承認，可以樂觀地預見，在那裏主權與民族的界線就不再像以往那樣了。中國國內各個民族需要從他們那裏發現靈感，那樣，新疆、西藏以及其他民族問題，都可以回到理想主義的路徑上來。

丁松泉 杭州
2008.10.22

革新是政黨的生命

回顧二十世紀，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政治上之所以能夠

成功，正如林閩鋼〈從福利國家到社會投資〉(《二十一世紀》2008年8月號)一文所指出，是「這些國家各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和工黨適應了各國的變化，特別針對全球經濟政治形勢的變化，務實地提出新思想、新主張的結果」。可見，一個政黨要想保持其持續的生命活力，在綱領、理論和政策方面進行及時的革新是關鍵。

一個政黨在其組建之初，也許能夠適應當時的社會要求，制訂自己的政治綱領，實施相應的社會政策，從而取得政治上的成功。但是，隨着社會的不斷發展，一個政黨如果仍死死抱住建黨之初的理論基礎、政治綱領和社會政策不變，那必然會引起人們的不滿。在民主社會，這個政黨肯定會失去其執政地位，而在非民主社會裏，這個政黨即使仍然坐擁政權寶座，但往往會因為依然堅持過時的指導理論、政治綱領和施政政策，而疲於應付早已變化了的社會現實中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到這時，這個執政黨已很難成為推動社會平穩和順利發展的政治力量，相反，可能因為要保持其執政地位而企圖將早已今非昔比的社會，拉回到執政黨所希望的生存條件之下。要做到這一點，無限地追求和使用國家權力是其唯一的手段。但這一手段長期運用的結果，必然會引致劇烈的社會動蕩，執政黨也一定會在動蕩之中失去其執政地位。

理劍 臨沂
2008.9.7